

解析庄子的“无用之用”

赖怡静

(厦门大学 人文学院哲学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庄子所提出的“无用之用”的人生处世理念,历来被研究者认为是消极避世或个人主义的人生哲学,这未免有失偏颇。本文根据庄子所处的时代和他的身份、地位,用历史的眼光及人格心理作客观的分析,认为庄子所追求的“无用之用”包含着深层的意蕴。

关键词 庄子 无用之用 辩证

中图分类号 G12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8772(2012)06-0162-02

庄子“无用之用”的人生哲学,是他整个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对其“无用之用”的思想有各种评价,褒贬均有之。我认为,庄子的思想博大精深,并富含辩证精神与人生的哲理和智慧,其“无用之用”说是一种包涵着深邃的社会内容和哲学思想的理论体系。必须对“无用之用”的思想做全面深入的把握,才能正确揭示出其中所蕴含的深刻意义。

庄子在《人间世》中,以一系列的寓言故事,去说明“无用之用”和因无用而避祸得福的哲学内涵。王先谦认为,“人间世,谓当世也。事暴君,处汙世,出与人接,无争其名,而晦其德,此善全之道”^①。面对无道之君,身处污浊之世,只有与世无争,韬光晦德,才能“善全”。这里的“全”,不光是形体的不受伤害、生命的不被毁灭,更重要的是精神方面的、人格方面的“全”,即是蔑视权贵、傲然独立、洁身自好,不卖身投靠,不做奴才。这不正是对独立人格的维护、对高洁人格的一种追求吗?

在《支离疏忘形》这则故事中,我们更可以看出无用之用的身体之福与精神之福(人格的独立)。支离疏因身体残疾而免于战死沙场,得以养其身,终其天年。面对人心惶惶的、被抓丁吓得鸡飞狗跳的危急境遇,支离疏逍遥自得,像没事人一样,从容不迫,不像别的被抓的壮丁,或被捆绑或被鞭打,或因家中有妻子老小怕战死沙场而可怜巴巴的、或声泪俱下地向官吏求情。这些伤害、侮辱都是精神上的、人格上的伤害侮辱,而支离疏均因“无用”而逃过这一劫。

对于庄子的“无用之用”、“隐遁避世”,有的学者认为,他强调了人生的自我价值,而否认个人对社会、国家的义务和责任,最终沦为极端的个人主义。^②这种评价有失偏颇。李泽厚先生则认为:“庄子尽管避弃现世,却并不否定生命,而毋宁对自然生命抱着珍贵爱惜的态度,这使他的泛神论的哲学思想和对待人生的审美态度充满了感情和光辉,恰恰可以补充、加深儒家而与儒家一致”。^③这种评价,主要是就道与儒两家的关系层面而言的。我们若考察一下庄子的身份、社会地位和他所处的时代,就更清楚地知道,他的不被用,正是他对自己人格的维护,是对自己尊严的维护,是一种不出卖灵魂、不依附于统治者的隐士的生活,是一种自由的生活。正是这种高洁的人格,影响了后世

的一代代知识分子,成为他们“不摧眉折腰事权贵”和“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支柱。

庄子的“无用之用”是基于对动乱社会的深刻观察和了解而提出的,这一思想的产生具有深厚的历史根源与社会根源。庄子生活于动荡不安、战乱频仍的战国时期。从《庄子》、《史记》^④等典籍的记载来看,庄子是一位生活于社会下层的知识分子,他一生贫困,但学问高深。《史记·老子韩非子列传》说他“其学无所不窥”。以庄子的地位、学问以及知识分子的敏感,他对当时的社会有着极其深刻的洞察。他感到“方今之时,仅免刑焉。福轻乎羽,莫之知载;祸重乎地,莫之知避”。统治者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争权夺利,暴力相向,倾轧不止,“轻用民死,死者以国量乎泽若蕉,民其无如矣”。(《庄子·人间世》)他认为当时的社会是“昏上乱相”(《庄子·山木》)天下无道。处在这样一个社会,庄子作为一个士,他对士的命运特别关心。庄子看到“梁杀关龙逢,封杀王子比干”(《庄子·人间世》),许多有为之士被统治者所屠杀。看看现实,许多智士英杰因为“有材”、“有用”而被乱世所残害。在《人间世》中,庄子写到“夫木且梨桔柚,果硕之属,实熟则剥,剥则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终其天年而中道夭”。有材之木,因为“其能”而“苦其生”、“中道夭”的情形,实际上是有为之士、杰出人材在乱世中的悲惨命运的形象写照。庄子以物写人,揭示了乱世残害人材,扼杀人材的黑暗现实。

庄子识透了社会的黑暗险恶,深深感到,个人若想在危机四伏的社会中有所作为,就很有可能被黑暗的社会所吞噬。“子独不见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东西跳梁,不辟高下,中于机辟,死于罔罟”(《庄子·逍遥游》)。社会中布满了“机辟”、“罔罟”,有材之士用材用智于这样的社会,就象狸狌一样,“中于机辟,死于罔罟”,生命不保。焉谈什么作为?要想有所作为,首先要学会保全自己。《庄子·人间世》说“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生焉”。天下有道,圣人就能成就大业;天下无道,圣人才能保全生命。有材之人能在乱世中避祸免害,保全性命,也是一门学问。那么如何能以“无用之用”来避祸免害,保存自己呢?《庄子·人间世》说了这样一个寓言故事:“故解之以牛之白颡者与月

收稿日期 2012-03-10

作者简介 赖怡静(1988-)女,福建厦门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法律规范、马克思主义哲学。

泵之亢鼻者,与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适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为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为大祥也”。祭祀河神的时候,白额头的牛和高鼻子的猪,以及长痔疮的人,因为被世俗看作是不祥之物,所有巫祝不用它们投入河中祭祀河神。庄子借以说明,被世俗看作“不祥”无用,有时恰恰能够成就免除世俗之害的大用。所以“神人以为大祥也”。庄子说这个故事的目的,是希望人们能从中悟出“无用之用”的道理。庄子通过对世态的冷峻观察,认识到忌贤妒能,不容人材,政治黑暗,官场险恶,是无道之世的通病。因此庄子提醒人们,当人处于黑暗险恶的社会环境当中,有材有用就会巡害时,就不宜再以有材有用的面貌出现,而应该隐才匿志,藏锋含芒,甚至给自己贴上一个“白颡”“亢鼻”的“无用”标签,这样才能避免受害,安生保命,这就是“无用之用”。“无用之用”的“无用”,不是真的无用,而是有用显出无用,清醒而装糊涂。“无用”的目的在于“用”,是通过“无用”而达到有用。这种“用”就是“全生、保真、养亲、尽年”,这就是人生最大的用。

有人认为这种“无用之用”是消极的,因为它只让人避祸免害,保全生命,而不让人去积极抗争。如果人人都以避祸免害为事,不斗争,不反抗,那么社会就不得进步了。这种看法具有一定的道理,但并没有真正弄懂庄子的“无用之用”。庄子的“无用之用”,主要是针对无道之世而提出的韬光养晦的应世技术,侧重点在于指导有材之士如何不被乱世扼杀了自己,如何更好地保护自己。当人处在某种险恶的形势下,而人对这种形势又无法抗争时,“无用之用”可以起到一种应付时局,摆脱困厄的作用,也可以起到不作无谓牺牲的作用,其中包涵着对现实生活,对生命的珍惜和重视,也包涵着对现实的一种理智的态度。这无疑区别于悲观厌世而具有积极意义。纵观庄子的整个思想,庄子对黑暗社会并不是不反抗、不斗争的。庄子的哲学就是批判的哲学,叛逆的哲学。他的文章的基本内容之一就是对社会对统治者的揭露和批判,而且庄子对社会弊端的揭露和批判是相当深刻而有力的。在“无用之用”的学说中,虽然侧重点讲的是如何保存自己,但在其中也灌注了庄子的社会批判思想。庄子所讲的那些成材之木皆遭砍伐迫害,不材之木都能“终其天年”的寓言故事,实际上是以自然界来比喻现实社会,其中包含着庄子对当时社会残害人材,不容人材的深沉揭露。在庄子笔下,有才正常的人,皆遭受打击迫害,而无用不正常的“支离疏”“白颡牛”“亢鼻猪”却得以安生保命。这种寓言中形象的塑造,本身就具有对社会不正常的揭露与讽刺,暴露了统治者的昏庸,政治的黑暗,字里行间渗透着庄子不可忍耐的愤世之情和

牢骚。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庄子的“无用之用”,并不是宣扬无用就能保全自己,也不是说无用就好。而是用辩证的眼光,看到了无用之中也存在着有用的一面。当人们面临险恶之境而又无可奈何时,要学会以“无用”而致大用。这实际上是寄沉痛于悠闲的。“无用之用”的人生哲学,是一份沉重的哲学,其中有许多生命和鲜血换来的经验教训。“无用之用”是庄子在不正常的社会中总结出来的一种人生经验,它既包含着庄子的处世智慧,也包含着庄子对社会黑暗,有才不能驰,有志不获聘的深深悲愤和不满。

“无用之用”的另一面作用,是让人们从世俗的功利的价值观念中摆脱出来,使人生达到一个更高的境界。

按照世俗的价值观,能获得功名利禄就是有用,反之就是无用。庄子通过对动乱社会的政治、仕途、官场的深刻观察和清醒反思,对这种世俗的价值观进行了反省性的批评。《庄子·列御寇》说了一个“舔痔得车”的故事。故事中的曹商,是靠巴结谄媚,为统治者“抵痔”而得到了赏车百乘的厚禄。曹商为了富贵,巴结权贵,为人“舔痔”,已完全丧失了自己的人格和尊严。《庄子·田子方》中说了一个“真画者”的故事,故事中的“众史”们,为了求取功名,一个个装腔作势,虚伪做作,奴颜媚骨,仰人鼻息,“丧己于物,失性于俗”,已失去了做人的“真”和自由。在庄子看来,以丧失人格、尊严、真性、自由为代价来获得功名利禄,是毫无意义的。世俗中普遍认为有用的功名利禄的获得,因其丧失了人更有价值的东西,而被庄子视作无用和无意义。

庄子的“无用之用”充满了辩证的智慧,表现了生活中有用和无用的辩证关系。有用和无用,有时是互为因果,相生互变的,在一定的情况下,无用可以转化为有用,有用亦可以转化为无用。“无用之用”的学说,蕴含着丰富的哲理和智慧。它是保持人格独立、追求人生自由的理论,也是超越世俗,达到人生高远境界的学说。发掘其思想的积极意义,努力把庄子的智慧溶进现代生活,发挥“大用”之“用”以提高现代人的精神境界,乃有其传统文化研究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 [1] 王先谦. 庄子集解[M]. 北京:中华书局本, 1987.
- [2] 黄伟合. 庄子伦理思想的理论特征[A]. 庄子研究[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6.
- [3] 李泽厚. 华夏美学[M]. 北京:中外文化出版公司, 1989.
- [4] 司马迁. 史记引[M]. 北京:中华书局, 1997. 2482. 43.

(责任编辑 栗玲)